

五四时期广东期刊介绍资料选辑

(内部资料)

石
志
了
刊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选印

1964年8月

说 明

本资料选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包括当时广东方面的刊物介绍和宣言部分。虽然还未能全部包括广东当时出版的所有期刊，但可作为广东党组织建立前后广东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布以及同无政府主义思潮斗争等方面研究的参考资料。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目 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青年”	1
新青年之新宣言	8
劳动者	13
劳动者发刊词（“劳动者呵！”）	18
劳动与妇女	21
劳动与妇女发刊大意	26
劳动周报（广州）	29
新海丰	31
新海丰发刊词一、二、	35
珠江评论	38
新学生	41
新学生半月刊宣言	56
新学生复刊启事（“告亲爱的读者”）	58
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	59
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弁言	61
光明（广州）	62
光明发刊宣言	68
光明发刊词	69
民 风	70
无政府主义的几种刊物	76
民 钟	79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青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时，“新青年”已迁到广州，正出版到九卷三号。党成立之后，“新青年”继续出版，一九二一年底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顿，到一九二二年七月出版九卷六号。结束第九卷后休刊。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改组成季刊，仍在广州出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①由于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计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第一期，十二月出版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第三期，十二月出版第四期。自此以后，原准备改成月刊，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按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第一号，六月出版第二号，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第三号，五月出版第四号，七月出版第五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到这一期为止。

“新青年”改组成季刊的时候，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卓越的政治家和文字家瞿秋白同志刚刚由苏联回国，他立即成为“新青年”的主编和最主要的作者之一，为初期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发刊词“新青年的新宣言”，便明白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理论性刊物的性质。“新宣言”中肯定过去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曾“成为革命思想的代表”；同时又指出“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因此，“‘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它宣布“‘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这个“新宣言”中所提出的若干原则相当显著地说明了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特点。

如前所述，改组以前的“新青年”，虽然早在一九二〇年

^①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中有关于出版物的决议案，称：“新青年”为中央理论机关报。这个决议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做出的。

己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但多少仍保持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逐渐地、以后并越来越显著地占据主要地位，但终于没有成为唯一的内容。直到党初成立后出版的三期也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某些较微弱的痕迹^①。但自改成季刊以后，它已成了纯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目的的刊物了。特别显著的表现是它大量介绍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而这在过去的“新青年”上是没有去着力进行的。从季刊到不定期刊一共只有九期刊物中，发表的列宁同志的著作计有：“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即“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二次大会上的演说）、“中国战争”、“革命后的中国”（即“更新的中国”）、“亚洲的醒悟”、“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专政问题之历史观”（即“论专政问题的历史”）、“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的不定期刊第一号是纪念列宁同志的专号，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紀念的宣言。斯大林同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刚刚出版，便大部份在“新青年”上译载了^②。此外，还发表了他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关苏联政治经济概况部分，和“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等文。另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大量地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季刊的第一期便是共产国际专号，除了译载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发表报道大会情况的文章之外，还发表了瞿秋白同志所写的介绍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介绍由第一国际到共产国际的简要发展史的几篇长文。此后各期也常刊载关于共产国际的报道和文件，以及介绍各国工人运动情形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文章占刊物的主要地位。一九

^① 人民出版社影印本第九卷说明中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亦曾一度以该刊为机关刊物”。影印本季刊是另有说明的，此处所说是系指第九卷四—六号。这个时期中“新青年”还发表了胡适等的讲文。

^② 原书的民族问题一章发表译文，标题为“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瞿秋白同志译述了原书第一、二、三、四、八各章的大部份，发表时总名“列宁主义概述”。

二四年八月出版的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当时刚刚公布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即一九二四年苏联宪法全文）的译文。

“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上的中心问题是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的理论上的论证。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与国民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接着便开始进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广泛展开工人和农民的国民革命运动直至准备北伐战争等巨大的革命工作。“新青年”季刊正好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月出版第一期，一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才最后停刊。在此期间，它肩负着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及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的一系列策略问题的重任，在宣传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青年”季刊的第二期正好出版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一期中瞿秋白同志的论文“国民性主义至社会主义”，根据列宁同志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阐述的原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他一方面斥责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伪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方面也反拨了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就是单纯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的空想，肯定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革命^①。他写道：“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主主义的改革——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如前所述，在准备建党的时期和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不少人由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缺少科学的认识，也曾简单地认为中国革命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同志明白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性质，便不只驳斥了党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也有助于澄清当时党内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残余，具有至大意义的。瞿秋白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根据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所论证的原理，从理论上指出了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指

① 这里所驳斥的是出现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今日”月刊上的一种论调。这个月刊创刊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与党成立之前北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并无关系。

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进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反性”。此后，“新青年”在宣传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曾有过较为显著的缺点，表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季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篇专门论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文章。彭述之的一篇空口说无产阶级领导权，却又把民族资产阶级说成似乎是毫不足道，据说“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做的事”，把当时革命的广州国民政府，说成“不过是几个新军阀、新官僚面子上拥戴孙中山的一个政府罢了”，他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在“左”的形式之下，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陈独秀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因为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投降主义倾向而受到大会的批判，但他一九二四年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的文章中并没有认真纠正这个错误，他虽然形式上说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督战者”（？）实际上却根本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隐匿起来，置而不论。这两篇文章虽然不能说明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的全部思想，但也是多少体现了他们殊途同归地一起滚入机会主义的泥坑的一部分原因的。

随着革命运动在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方针领导之下的迅速发展，到了一九二六年，革命的北伐战争已经在积极准备和着手进行，于是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便进一步提到党的面前来了。北伐开始前出版的“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三、四各期上，瞿秋白同志在研究“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扩大武装势力，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的要求。他并写了专门论文“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问题”，指出需要“实行总解决的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从事于革命作战”。这时盘据在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对武装斗争问题有错误的观点，而瞿秋白同志的观点则是与陈独秀等对北伐持消极态度，不提革命战争的口号，不强调武装工农，而企图以争取军阀部队为中心的观点①相对立的。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同

① 见不定期刊第五期中陈独秀所著“世界革命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志较早的文章中虽只提出“组织农民拒租减租或租互助合作的运动”，以后也补充了向农民“指出耕种应有的目标”的要求。

“新青年”季刊的另一个功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一九二三年，在资产阶级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所谓“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个论战是在一方面实际上以胡适为首、形式上以丁文江为首的一派与另一方面以张君勱为首的一派两种主观唯心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张君勱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他公开宣传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不能对人生观作科学的解释，而胡适、丁文江等则在反对玄学、维护科学的名义之下宣扬了腐朽的实际上为帝国主义买办势力服务的实用主义思想。这个论战原只是两派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内哄，但论战的实际意义却又不只于此。因为在这个论战中，胡适和丁文江窃据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科学”，这一派的胜利便会加强他们以新文化运动的正统自居来散布实用主义毒素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过问的。因此，“新青年”主要是瞿秋白同志便终于干涉了这一场论战，展开了反对实用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他批评所谓“科学派并没有战胜”，认为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侵，因此不肯用”，他所指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以及第三期上发表的“答张君勱及梁任公”一文中，他曾宣告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并试图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争论中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懂得为什么胡适丁文江等不相侵、不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武器，因为他不懂得胡适一派所鼓吹和信奉的实用主义正是最反动而又最具欺骗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相敌对的；不仅如此，他自己还深受着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也并没有能对争论中的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有不少论点实际上还是唯心主义的。陈独秀的文章一般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号与论战中的两派对立起来，这是好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力量完全揭穿实用主义的蛊惑宣传，因此他不可能对论战作出完全正确的批判。

对这个论战给了正确的批判的是瞿秋白同志。他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哲学论文“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针对张君勱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这

种唯心主义的谬论，指出社会现象同样有客观的规律，并根据“自由与必然”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的原理阐释了自由意志的问题。他指出：“社会现象确有因果规律可寻，唯知此因果规律之‘必然’，方敢得应用此因果规律之‘自由’，彻底打破了张君勱的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观。但是他在这一论战中的主要功绩与其说是对张君勱的批判，不如说是他彻底揭露了实用主义的伪科学的唯心主义的本质。张君勱公开宣扬唯心主义固然是极端反动的，但胡适、丁文江等假拥护科学之名，掩盖着那主观唯心主义的实际面目来宣传实用主义却更毒辣，在当时具有更大的蛊惑作用。彻底粉碎这种蛊惑宣传就意味着打破胡适等窃据五四时代“科学”的大旗的阴谋，继承和发展五四运动的革命的传统。因此，“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发表了瞿秋白同志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深刻地指出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本质，便是要“工人阶级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怎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使工人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而“不至于‘妄想’”。他指出实验主义是“改良派”。他引用实验主义者的教主詹姆士的理论并加深刻的批判，主要是真理观上的批判，指出：“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真实，并且也没有客观的真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这样，他就揭开了实用主义者胡适、丁文江之流拥护科学的骗人的外衣，他写道：“实用主义带着科学方法来到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此，他并进而反致了一种认为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很相近的误解和混淆，他从理论上看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与实用主义的“有益”观点的本质不同，也指出了在实际应用上马克思主义指向革命，而实用主义则指向妥协。这篇文章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彻底揭露了实用主义反动思想的第一篇文献。

这两期“新青年”上还发表了若干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是与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问题有关的。

总之，“新青年”季刊在不定期刊出版于党的幼年时代的中期。这时革命运动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有很大的发展和胜利。这个时期中的“新青年”发扬了“五四”前后的战斗传统，并变成了纯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刊物，变成了党的最早的

理论性机关刊物之一。它宣传了党在革命迅速开展时期中的路线和策略，贯彻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大力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对反对的实用主义思想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有很大的成绩。只是，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因而“新青年”在宣传中也就难免还杂揉着若干不明确的乃至错误的观点，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新青年之新宣言

——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崭新；请几万万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立宪。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续！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歌德之“浮士德”(Goethe, "Faust")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生。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万不得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第一国派及奴才制度的满清宫廷败落互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未有受伤。如何能有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礼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愚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同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

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之先趋。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具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网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恐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负担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废，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取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吸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找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将与宗法社会的思想行剧烈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即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冤死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敷衍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的残酷，军事思想都在其垄断而又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

的思想机关既不能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逼感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

派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显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民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明其妙，于是只好像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常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一切，包括文学以至文字，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象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的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滞于目前零碎的现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大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知求竹漏高深辽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计划的立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详加解释，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状况，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不用搬出种种现成模型，勉强要中国跟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流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

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反映。一切文学艺术思想之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坠陷于那混沌颠倒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假可以排比并观，考察其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重位，所以觉得各有名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涵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文化上封锁三十多年，如今正是渗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发达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有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作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的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减计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有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行

动，帮助实际行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至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 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米

米

米

“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知识上的武装，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而现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肇顿之时，特以此“国际共产号”为其第一期。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劳 动 者

“劳动者”于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创刊，每星期出版一册，先由广州天民报、后由群报总经售。我们见到的有第1至8号。

“劳动者”周刊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刊物用朴素和热情的语言向工人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工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劳资的根本对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革命道理。当时人们曾将“劳动者”和“劳动界”、“劳动音”誉为兄弟刊。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成立后即创办此刊。创办此刊的目的是为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从而将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所以创刊号上说：“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人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即如云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①

刊物一开始就歌颂了劳动神圣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指示：“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②既然人类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工人无疑便是“世界的主人”了。但是刊物接着指示因为工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他们的生活都是极端下的：“种田的吃不到丰饶，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③他们认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富人夺去，实在是天下间最不平之事”④，指示和世界上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是“格外苦脑的人力”。

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刊物对工人阶级所受压迫、

① “劳动者”呵，第1号

② 同上

③ “劳动者”呵，第1号

④ “告工人”，第2号

受剥削的阶级根源作了分析，指出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和根本改变社会的必要性：“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有费的分配权。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①同时，他们还揭穿了当时在一些官绅政客中风行一时的所谓以“开发实业、教育、交通”来“救国救民”的欺骗伎俩，认定只有“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②才能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发达交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某些阶级调和论者企图缓和劳动矛盾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们责问说：“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美华辉煌，你们住的是破屋一间，不蔽风雨，人家吃的是膏粱文绮，食前方丈，你们吃的是粗饭茶羹，不能一饱，人家穿的是綾罗熟棉，巧艳夺目，你们穿的是破衣败絮，仅可蔽体，这是公道的事吗？你们要变更这种不公道的环境，资本家答应吗？劳资可以调和吗？”③他们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坚定地认为，有资本家的利益，就没有工人的利益，有资本家的自由，就没有工人的自由，因此要资本家“高抬贵手，施点仁慈”是绝对行不通的！根本的办法，就是“由平民振起，由农民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④“劳动者”对农民问题也同样重视，他们向农民说：“你是最重要的，必要发奋而起，明白你现时所处的地位，都由于大商家、业主、官吏、军队所赐的，你就要想一个方法，离了他们，才是正当的道理。”⑤

“劳动者”还以具体、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牛马般的生活，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及时报导了各地建立工会组织消息和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以不断提高工人阶级觉悟，激励工人斗争意志。此外还登载不少专门向工人介绍苏联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及土地政策的文章。

①“劳动者”第1号。

②“最趁前的三件宝贝”，第8号。

③“劳资调和的疑问”，第7号。

④“共产党的粵入治粵主张”，第2号。

⑤“和耕田朋友的谈话”，第6号。